

## “东北亚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北亚”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区域。无论是令世人眩目不暇的各种争端和事件,还是萦绕耳畔的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各种声音,都需要探究甚至“拷问”其深层次的缘由。回顾历史,有助于排解众多令人难以纾解的现实纠结和困惑;审视当下,有益于辨识悠长历史演变的旋律和节奏。对东北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尝试着在理论层面上建构新的解读东北亚历史的“路线图”;对东北亚区域文人史观的考证呈现出微观实证研究“尺树寸泓”的细腻质感;对东北亚空间的历史透视凸显了中西古今相互比照的“力道”;对现代东亚国际体系建构时期区域安全模式的分析扩展了东北亚史研究的空间和维度;对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剖析考验着东北亚各国在主观上如何抉择。历史的“筋骨血肉”俱在,历史学却“身姿百态”,因而,东北亚的新“变局”需要新的“东北亚史研究”去辨识。

### 东北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刘德斌

(吉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局势的演变正在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原因有诸多方面:朝鲜半岛局势的风云变幻,中朝美日韩之间关系的跌宕起伏,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与政治上的摩擦不断,等等,东北亚地区出现了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整合与分裂并行的局面。媒体上的新闻不断提醒着东北亚各国人民:虽然彼此往来愈加频繁,但依然时时刻刻面临着如何在内心深处面对彼此、认同对方的问题。

此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的内政、外交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新时代。区域研究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焦点,区域史研究也就成为历史学界难以逃避的课题。然而,与国别史和世界史比较而言,区域史的研究和建构更加不易。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能够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因此,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不能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任意切分,而必须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所覆盖的地域。而所谓自我说明问题,是指其历史具有特殊性、连续性

收稿日期: 2010-09-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东北亚史研究”(07JJDGJW 252)

作者简介: 刘德斌,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军, 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乃和, 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东波,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王秋彬,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与完整性,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至少应该在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等三大方面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这是识别区域的三个基准。东北亚史由此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现实意义:东北亚各国能否跨越历史的芥蒂和现实的障碍而形成一种共同体的认同?东北亚史的研究应该并且能够为这种认同提供一种视角,因为真正意义上东北亚区域史的研究并不是东北亚各国历史的简单叠加,而是将东北亚作为一个本体进行研究,互动、结构、认同成为区域史研究的主要因素。互动与认同的发展推动区域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区域结构界定了区域的边界,是区分不同区域的标识。区域史研究是对传统的国别史研究的一种突破和补充。另外,东北亚区域史既需要对古代东北亚史作进一步的探讨和挖掘,还应该解释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的遭遇对当今东北亚各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区域史研究往往指的是中国国内的区域研究,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则很少被置于区域史的框架之下。突破国别史研究的范式,构建起区域史研究的视角是深化东北亚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中国学者而言,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史与世界史专家的合作能够助推中国学术界在区域史编纂与实践、区域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等方面的进步,从而探索出一条新的学术增长之路。

东北亚史研究取得突破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把这一区域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置于全球化的视野或全球史的背景之中来考察,由此,我们会发现东北亚区域史进程在全球化进程中所经历的冲击和断裂,是构成东北亚近代史的基本背景和当今东北亚地区整合与分裂并行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困局的历史根源。吉林大学历史学科不同专业的学者经过努力构建起一个东北亚史的解读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我们对东北亚的时空进行了“区域化”重构。首先,基于自然地理范围与地缘政治变迁的考虑,将东北亚界定为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尤其是该区域中西太平洋地区。其次,基于区域历史演进的线索,我们对东北亚区域历史进行了大致的分期,即萌动与交融时期(10世纪以前)、多元与一体时期(10世纪初至1840年)、转型与博弈时期(1840年至1945年)、两极化与多样性时期(1945年至1991年)和多样性与区域化时期(1992年至今)。《东北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的突出特点是突出了东北亚区域内部各个族群、国家间的文化互动、经济互动、政治与军事互动对东北亚区域认同的影响。

作为区域史意义的东北亚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的领域有待拓展,研究议题尚需深化。专题性研究是推动东北亚区域研究的必要手段,在深化大国关系研究的同时,将研究范围拓宽至东北亚区域内经济、社会、族群等层面。在这个方面,有必要了解与参照世界其他区域发展历史的进程及其区域史编纂的实践,在东北亚史与世界其他区域历史的对比与反思之中构建起一种新的区域理论与历史编纂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区域史研究是对国别史研究的扩充与超越,它能够把被国别史“撕裂的碎片”缝合起来;同时区域史又是全球史的中介与补充,是构成全球史的主要部件。区域史研究既需要全球史的宏阔视野,又必须兼顾国别史的厚重与细腻。

东北亚历史的演进是传承与断裂的辩证统一,是内部演进与外力突变的结合。东北亚历史进程的断裂肇始于外部的压力,西方殖民势力的介入打断了东北亚自身历史演进的逻辑与节奏。首先,西方的殖民活动将东北亚地区强行纳入全球性国际体系的边缘之中,东北亚的历史成为全球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其次,西方势力的介入打破了东北亚既有的国际秩序与组织原则,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受到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原则的国家体系的挑战,民族国家取代了帝国,东北亚的政治组织模式、经济交往生态都发生了急剧转变;最后,西方的民族国家原则、国际法、国际条约逐渐成为近代以来东北亚认同的核心内容。与外部势力介入同步的是东北亚内部也发生了急剧变化。首先,日本经过改革率先崛起,在应付西方压力的同时又试图把东亚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东北亚区域的中心从中国转向日本;其次,日本的扩张既受制于西方大国的制衡,更来自于东亚各国的反抗,日本主导东北亚的“宏图”随着二战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最后,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与日本的相对停滞,东北亚国际结构面临着新的调整;与此同时,美国的影响和全球化的力量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和塑造着东北亚各国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变迁,从而使东北亚区域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历史形态。

当东北亚各国经过百年的努力重新步入一种新的发展轨道时,对历史的解读实际上成为构建东北

亚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同欧洲一样,东北亚区域既有冲突的历史,也有长时间延续的稳定的区域秩序。在全球化进程已经蔓延至全球每个角落的今天,任何地区都难以复制历史上存在过的种种秩序,东北亚地区也不例外。但对区域历史不同侧面的挖掘却可以直接影响到当今的历史认识,从而影响到当今世界各地的区域认同。东北亚仍然处于传统意义上东亚秩序崩塌之后的转型时期。东北亚史的研究和撰写不仅在解读过去,也在塑造现实,影响未来。东北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重大和重要。

## 试析朝鲜李朝文人疆域史观之误

——以对安市城的认识为中心

杨 军

(吉林大学 历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高句丽安市城,即今辽宁省海城市东南 15 里营城子高句丽古城。<sup>1</sup> 唐太宗征高句丽,因久攻安市城不下而撤军,这是李朝文人在谈到“东人善守城”时津津乐道的战例。可是,多数李朝文人却认定,高句丽安市城在今辽宁省凤城县的凤凰山上,即那座被他们称为凤凰城的古城遗址。<sup>④</sup> 也曾有李朝学者对此说法进行批驳,如:成以性(1595-1664)《燕行日记》“世言唐太宗所征安市城,而口舌所传,真伪谁知。”朴世堂(1629-1703)《西溪燕录》和李宜万(1650-1736)《农隐入沈记》都有详细的考辨,足以证明此说之误。但李朝文人对此错误说法却仍哄传如旧。李观命(1661-1733)《屏山集·过安市城感吟》自注:“世传:有人于关西山谷中遇一毛人,自言以安市城卒,奔窜饵松叶,不死。问城将之名,杨万春云。”显然,称当年守城拒唐兵的城主名杨万春,是后世的民间传说。李德懋(1741-1793)《蜻庄馆全书》卷六六《入燕记》已指出:“城主世传姓名杨万春,三渊诗亦用之,然尹月汀谩录已辨其出于《唐书演义》不足取信”,<sup>④</sup>但很多李朝文人却都将此传说附加在凤凰城为唐安市城的传说中广为传播。

<sup>1</sup>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 页;孙进己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6 页;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09 页。

<sup>④</sup> 持此观点的朝鲜李朝学者及其著作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崔博(1454-1504)《锦南集》卷五《漂海录》赵纬韩(1567-1649)《玄谷集》卷五《七言律诗》金世濂(1593-1646)《东溟集》五《柵门外望安市城》姜柏年(1603-1681)《雪峰遗稿》卷一四《安市城途中偶吟》申昺(1628-1687)《汾厓遗稿》卷五《燕行录·安市城》李世白(1635-1703)《雪沙集》卷三《安市城次副使韵》任相元(1638-1697)《恬轩集》卷一五《安市城》吴道一(1645-1703)《古坡集》卷五《后燕楼录·安市城》赵泰采(1660-1722)《二忧堂集》卷一《过安市城》李观命(1661-1733)《屏山集》卷二《过安市城感吟》李宜显(1669-1745)《陶谷集》卷二《安市城》李德寿(1673-1744)《西堂私载》卷二《安市城》李匡德(1690-1748)《冠阳诗集》卷一《安市城》徐命膺(1716-1787)《保晚斋集》卷一《安市城》蔡济恭(1720-1799)《樊岩集》卷一一《含忍录·安市城》金煜(1723-1790)《竹下集》卷四《过安市城旧墟》洪良浩(1724-1802)《耳溪集》卷一三《安市城记》柳得恭(1748-1807)《冷斋集》卷三《古今体诗·安市城》李晚秀(1752-1820)《寝园遗稿》卷一二《辘车集·安市城》赵秀三(1762-1849)《秋斋集》卷三《安市城》许筠(1569-1618)《惺所覆瓿稿》卷一《丁酉朝天录·驻蹕山歌》金增(1580-1658)《潜谷遗稿》卷一《凤凰山》崔鸣吉(1586-1647)《迟川集》卷六《次凤山韵》金世濂(1593-1646)《东溟集》卷五《柵门外望安市城》南龙翼(1628-1692)《壶谷集》卷一二《燕行录·塞上曲十四绝》金锡胄(1634-1684)《息庵遗稿》卷七《捣椒录下·凤凰山》金昌翁(1653-1722)《三渊集》卷一一《送大有随伯氏入燕》金昌业(1658-1721)《老稼斋集》卷五《燕行坝笈录·谨次辽东先韵》洪大容(1731-1783)《湛轩书》外集卷九《燕记·凤凰山》朴趾源(1737-1805)《燕岩集》卷一一《热河日记·渡江录》赵文命(1680-1732)《鹤岩集》卷六《燕行日记》宋相琦(1657-1723)《玉吾斋集》卷二《凤凰城》李瀛(1681-1763)《星湖全集》卷二六《答安百顺》(丙子)、金允植(1835-1922)《云养集》卷三《安市城吊古》崔锡恒(1654-1724)《损窝遗稿》卷八《因边虞陈所怀疏》金寿兴(1626-1690)《退忧堂集》卷二《别南九相再赴燕山之行》李匡师(1705-1777)《圆峤集》卷一《城上拜》等。

<sup>④</sup> 此“三渊诗”指金昌翁(1653-1722)《三渊集》,“尹月汀谩录”指尹根寿(1537-1616)《月汀漫笔》。查《月汀漫笔》原文为:“壬辰乱后,天朝将官出来我国者有吴宗道,谓余曰:安市城主姓名梁万春,见《太宗东征记》云。倾见《唐书衍义》则安市城主果是梁万春。”可证李德懋引文有误。余时让《涪溪记闻》称《唐书衍义》为明朝人所著,则尹根寿所引,更可能是明朝人中间流行的一个相关传说,尹根寿不过是用另一传说否定此一传说而已。李德懋虽在批判流行的谬说,但其论述却还是在以讹传讹。